

中国预测学史稿

(简体字版)

(香港) 蔡敦祺 著

ZHONGGUO YUCEXUE SHIGAO

一部具開拓意義的史學專著
填補中國方術史研究的空白

香港人民出版社

中国预测学史稿

(简体字版)

(香港) 蔡敦祺 著

香港人民出版社

中国预测学史稿
(简体字版)

蔡敦祺 著

香港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香港屯门井财街7号2字E室)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5 字数 469 千字

2003年7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962-8488-41-4

定价:港币 100 元 人民币 80 元

自序

一九九六年邵伟华先生组织并主持的中国首届易经应用学术研讨会在湖北鄂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数百名易学工作者聚集一堂，研讨易经实用学术问题，交流应用实践经验，切磋实用预测技术，会议开得十分热烈而有序。国际易经学会主席、美国著名易学家成中英教授专程赶赴鄂州参加这次会议，为大会生色不少。我也应邵先生之邀陪香港著名堪輿大师陆毅先生参加这次会议。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讨论如何将“易”的原理运用于预测实践。大会收到数百篇论文，精选数十篇打印供与会者参考、讨论。作为“实用易”的观察者，我从这些论文中确实深获教益。

有一天午膳之后，同席的朋友们谈兴犹浓。有人提到目前还没有一部全面记述“易”的产生和发展历程的史著，尤其是“实用易”的源流，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真是令人遗憾。我说易学耆宿金景芳教授的三位入门弟子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等先生合著的《周易研究史》已于九一年七月由湖南出版社出版，是一本水准很高的史著，值得推荐给易学工作者参考。于是朋友们纷纷议论起来，最后的结论是：“周易研究史”并不等于“周易应用史”；当前广大易学工作者尤其是从事预测实践者最急需的尚非记录《周易》哲理研究历程的史著，而是需要一本记述各类预测实践活动的起源、发展、成果、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史著。简言之：预测实践工作者急需的不是“周易研究史”，而是急需记录中国数千年预测实践活动使人从中可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并获得启发去创造新成绩的“中国预测学史”。

鄂州研讨会后，邵伟华先生希望我能承担起撰著《中国预测学史》的重任。当时我已辞去一切工作闭门读书写作，日子过得挺悠閒，所以不假思索便答应了邵先生的请託。谁料就在我正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几位文林前辈将撰著长篇历史传记小说《林则徐》的工作付托给我。这是一项具重大现实意义的政治任务，我没有任何理由推托，不能不竭尽绵力努力执行。除了这项写作任务，九八年起我与几位友人受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委员会之命编纂九七年和九八年的《香港文学年鉴》，花掉我将近两年的工作时间。直至《林则徐》出版并于二〇〇一年九月获中共中央宣传部颁给第八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后，我才算松了一口气，恢复“自由身”。

说实话：我几乎已忘记了五年前应允邵先生撰著《中国预测学史》的事了。但正当我准备着手写另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时，我到深圳探访邵先生，他再次提起这件事，并嘱我务必尽速进行，希望一年内能完成初稿。

我深感愧疚，因为我几乎忘记了五年前的承诺。所以从深圳回来后我立即将原先准备好的资料再搬出来，重温一遍，拟订撰述提纲并开始写作。一年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幸而大量资料都曾研读过，现在只是温习而已，不算太花时间。因此总算如期完成了这件差事。

我之所以详述本书的写作缘起和撰述经过，是为了说明以下几点：（一）这是一本讲中国各类预测实践活动的起源、发展、成果、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史书，属于中国文化史的范畴；它不是周易研究史，也不单是周易应用史；严格地说，它更接近于方术史。希望读者注意及之。（二）中国几千年来的预测实践活动门类极多，活动形式五花八门，其中交错着科学与迷信、智慧与愚昧、真实与虚假、超前与落后。在令人眼花缭乱且数量极其庞大的史料面

前，本书只能择要撷取而绝不可能兼收并蓄无遗。尽管笔者在述史过程中已努力以现代科学的眼光去剔除迷信、愚昧、虚假、落后的内容，但限于认识水平，仍可能有不少“漏网之鱼”。读者对本书所用的史料应当有独立思考与判断，这是作者无法代替的。

（三）本书虽然孕育时间很长，但实际写作却颇为匆促，因此无论是史料抉择、史实叙录，还是分析评论、稽古钩沉等等都必定存在各种各样的缺点错误。因此有待各界方家不吝赐教。

本书能撰成出版，应感谢邵伟华先生之鼓励与敦促；没有邵先生的敦促，就没有现在呈献于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谨在此向邵先生深致谢忱。

是为《中国预测学史稿》序。

蔡敦祺 谨识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于福州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上古时代的占卜术	16
第一节 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	16
第二节 田野考古将卜筮之源追溯到伏羲时代	20
第三节 卜之发明与演进	27
第四节 筮之发明与演进	32
第五节 “三易”及史前其他预测术	41
第二章 夏商时期占卜术的发展	58
第一节 龟卜从萌芽、成熟到鼎盛	58
第二节 商代龟卜制度与卜官集团	68
第三节 龟卜长期发展不衰的原因	80
第四节 夏商科技、哲学之发展与筮易之兴	86
第五节 龟卜与占梦、占星及其他	101
第三章 两周卜筮之消长	107
第一节 周代全面继承商的占卜文化	107
第二节 龟卜之传播、普及和没落	116
第三节 从《左传》看龟卜之占验率	122
第四节 筮与阴阳五行理论的发展	128
第五节 周代著名占卜者和孔子	133
第六节 多种新预测术的萌生	144
第四章 秦汉的谶纬迷信与预测学之发展	164
第一节 秦汉谶纬之风的兴衰	164
第二节 秦汉筮易之传承与发展	170
第三节 汉象数易对预测科学的贡献	195
第四节 古三式的传播与发展	214
第五节 龟卜、占梦、相术和堪舆	225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的预测术	237

第一节	三国至两朝易学发展概况	237
第二节	占梦、堪舆和相术的发展	251
第三节	多种杂占的消亡或新萌	264
第六章	隋唐五代预测术的大进展	276
第一节	隋唐五代易学发展概况	276
第二节	隋唐科技与方术共生并发现象	290
第三节	算命术之产生、发展和成熟	312
第七章	宋元预测学的新突破	325
第一节	宋元象数易学之再度崛起	325
第二节	邵雍对预测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348
第三节	各种预测术兴衰概况	363
第四节	杯珓、扶乩及其他	383
第八章	明清预测学之大普及	389
第一节	象数易的普及和朴学易之出现	389
第二节	算命术理论体系之完善和普及	400
第三节	明清式占之存亡	410
第四节	多种预测术形成理论体系	423
第五节	其他预测术兴衰概况	455
第九章	二十世纪预测学界之动荡	464
第一节	动荡世纪易学界之大动荡	464
第二节	二十世纪预测学之低潮与复兴	480
第三节	董慕节和五十年来港、台预测学	489
第四节	邵伟华和大陆当前的预测学界	511
第十章	预测科学史之反思与展望	526
第一节	反思预测科学史给我们的教益	526
第二节	新时期预测学理论发展之前瞻	557
[附录一]	邵伟华传记载入《丰碑·风采卷》	600
[附录二]	先天卦数及其二进制读法	602
[附录三]	社会变革与八卦先后天方位之变	610

引 言

概 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一门崭新的学科——未来学。该学科的根本任务是总结人类社会各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发展历程的经验并根据这些经验去展望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可能性，从而预言若干年后人类社会各方面的状况。从事这门学科研究工作的专家们实际上只做两件事：一是反思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和事物发展的规律；二是瞻望前景，分析社会现状并根据历史经验和事物发展规律推测社会未来的可能状况。三十年来有不少未来学家对社会发展的推测十分准确，如在电脑联网技术出现初期就预言全球性电脑联网的“信息时代”必将来临，如在七十年代就预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等等。这些预言对推动人类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加速发展无疑都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未来学”虽是一门新的学科，但其渊源却非常古远。这是因为希冀预知未来是人类的天性。无论古人还是今人，无论帝王将相还是百姓平民，都希望能预知前程吉凶，以便设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在人类蒙昧的幼稚时期，人们瞻望前景的手段极其原始并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人们对运程的前瞻、估计、预见往往与对神明的崇拜、畏惧、顺从混淆在一起，因而对未来的探索就成为极少数人（如古代西亚地区各族的“先知”，古埃及的法老、祭司，古欧洲的“预言家”、“通灵者”）的“专利”。

品”。现代西方未来学的哲学基础和许多运作手段（如逻辑学、概率论、心理分析等），其实是在古代西方的占卜、星相、占梦等等“方术”的基础上历经数千年发展而“蜕变”出来的，是西方传统文化优秀的“内核”与现代科学结合的成果。可以说现代西方的“未来学”与古代西方的“预言术”的关系，既是一脉相承，又有突破和创新。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其内涵、传统、特点及发展历程等方面固然有巨大的差异，但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们对未来的求知欲望却是一样强烈。因此，创造过灿烂辉煌古代文明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在其数千年文明发展历程中，也曾有与西方文化相似的，却又充满东方色彩、中国特色的古典的“未来学”。

中国古典的未来学所使用的预见未来的手段非常丰富多彩，包括最古老的骨卜、龟卜、筮占和两千多年前已发展到很高水准的易占，又包括星气之占、式占、择日、历忌、刑德、风角、五音、占梦、厌劾、妖祥、面相、骨相、掌相、谶纬以及迷信色彩极浓的扶乩、求签、符咒等等，还包括了后来象数易学派开发出来的推命术、梅花易数、铁板神算等以至门派繁多的从古代卜居、卜葬发展出来的堪舆学（俗称“风水学”）。这些“方术”（方指方法、方式、药物等；术指技术、技巧、法术等）被包括入秦始皇焚书坑儒都不焚其书的“医卜星相”之中，统称“数术”，也称“术数”（数，即历数；术，即方术。二者合称，统括医卜星相诸术。“医”还包括了医术、养生术、房中术。）

形形色色的预测未来的手段，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道引人注目瞩目的风景线。在这道奇特而绚丽多姿的文化风景线上，交织着科学与迷信、智慧与愚昧、真实与虚妄、深刻与肤浅、高雅与庸俗、超前与落后。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些方术衰亡了，也有些方术发展了，并且由于经验的积累和实践者刻苦探索而发生

了质的飞跃。

现存的多种预测未来的手段，尽管大多经历过数百年乃至长达两千多年实践的检验，显示出具有可重复性、可操作性等现代科学所要求的某些性质，而且其预测未来的准确率之高，从某些史籍载录的大量事例看来简直令人感到震撼；但是由于古人未能解释这些预测手段的科学原理，往往便将其准确预测的功能归结为“神示”，认为冥冥之中鬼神通过人们进行的某些仪式（例如向神灵、祖师焚香献祭）把未来将发生的事告诉求问者。于是古代预测手段科学的“内核”便被披上了宗教迷信的外衣。加上有些掌握着某种预测手段的人为了自高身价或保守秘密，更是刻意制造各种各样的神话、谎言，其预测手段便被各种人为编造的“神异现象”所掩盖，时日愈久愈显神秘，成为带有浓厚东方文化色彩的“神秘文化”，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术数的科学与迷信并存状态延续了两千多年，直至清末由于西方文化传入的刺激，才促使一些有识之士对传统术数种种奇怪现象开始进行系统的反思，其中包括了对中国古代易占术从义理、象数到应用技术等方面深刻的反思。于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易学热”高潮，人们从哲学、史学、文化、数学、宗教、文学、科技等等方面对“易”的本质、原理、哲理和实用技术进行了周详的研究。若干年后“科学易”（将易的哲理应用于自然科学研究）之兴起就是肇始于这一次易学热潮。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第一次“易学热”退潮。此后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社会原因，人们对易学及各类“术数”的研究沉寂了半个世纪之久。直至文革大动乱结束，国家迎来了开放改革的春天，文化界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令人鼓舞的大好局面，一

次新的“易学热”才有了其必然产生的现实基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西安一位默默无闻的民间“占卜者”邵伟华运用传统的易占技术成功而精准地预测出苏共领袖契尔年科“必死于次年农历正月中下旬之交”。此事不但震惊了社会科学界许多著名学者，而且引起国家保密的科学研究工作高层领导人的重视。在有关部门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邵伟华付出多年心血写出了一系列周易应用的科研论文；他将“易占”这种古老的预测手段运用于地震预报、侦缉罪犯、优生优育、天气预报乃至寻找失物、商务决策等等与社会民生关系密切的事项上，都取得令人惊叹的佳绩。九十年代初，邵伟华撰著《周易与预测学》和《四柱预测学》在大陆和香港同步出版，于是掀起了二十世纪中国群众性《周易》应用热大潮。几年间大量应用易学研究论文和专著纷纷发表、出版，还有大量古代术数类著作也经专家校订、标点、注释或今译而重新印行。与此同时，数以十万计的易学爱好者自发地开展“学周易，用周易”的活动，不但有许多人将书本上学来的知识用于日常生活的预测实践，而且有许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士将周易的义理和象数学说与现代科学知识结合起来用于实践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邵伟华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精华作出两大贡献：一是他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勇气率先冲破被禁锢多年的“象数应用禁区”，掀起中国文化史上尚无先例的群众性“周易预测应用热”大潮，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周易》焕发新的青春。二是他在其两部学术专著中提出“预测学”这个既古老又新鲜的学科的概念，倡导剔除各类术数落后、迷信、神秘、庸俗的糟粕，以现代科学的精神吸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建立科学思维运用传统手段以服务于社会民生，从而为各类术数之运用实践开拓了广阔的新空间。

十几年来，广大预测学理论研究和实用工作者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未来学”即“预测学”方面，已经创造了许多喜人的成绩，证明中国的预测学比西方的未来学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发展前途（例如西方未来学往往只能就宏观角度作出预言，而中国预测学则不但能宏观而且能从微观角度作预言）。但是在成绩面前我们也不能不看到预测学界的不足和一些令人不无忧虑的现象，因而不能不指出存在的这些问题并努力寻找去除隐患和弥补不足的办法。

当前预测学界存在的问题和了解 中国预测学发展历程的现实意义

当前国内预测学界存在的令人忧虑的问题有三：

第一，研究预测学理论者与从事应用实践者相脱离，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不能做到理论从实践中来，实践获理论指导。许多理论工作者不做应用实践，闭门造车，写一些既无助破解预测学之“谜”又不能指导预测实践的文章，这是徒费心力说空话，于理论工作、于应用实践都没有任何益处（笔者按：易学界一些理论工作者致力于易经易传的哲理、考古、文学等等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易学界整体理论水平，其工作值得赞扬，不属此处所说“徒费心力”之例）。另一方面是大量应用实践者只管实践，忽视在理论上提高，也不肯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以致应用实践的水平长期不能提高。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状态，在当前预测学界是十分普遍的。这种状态若长期延续下去，必造成预测学界水平低落，理论是空头理论，实践是盲目实践，还谈什么提高水准与突破、发展？

第二，预测工作者的道德素质不一，良莠难分。当然大部分

预测师道德素养和操作技术是好的，可是也难免有滥竽充数、鱼目混珠者掺杂在从业者中，这类人大多是抱着“到江湖上混口饭吃”的心态走进这个行业的。又有些不学无术、唯利是图者混迹这个行业，他们妄顾公德，骗财骗物，破坏了行业的声誉。还有一种人拉帮结派，佔山为王，打击他人，吹嘘自己，破坏团结，制造分裂，搞乱预测行业的正常运作。据笔者几年来冷眼旁观，目前预测工作队伍中个人主义盛行，自由主义泛滥，上述现象处处皆可发现。这些现象严重妨碍了预测学界整体形象的提高，也严重阻碍了预测科学理论研究和实用技术的进步。

第三，最为令人忧虑的是有些预测师从师父那里学到某种“秘传”的术数，同时也继承来一套神秘秘的“施法仪轨”，因而在应用实践之际，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实际上便是在进行迷信活动。有些预测师信奉某种宗教，在其实践活动中往往也会有意无意地将预测工作与其信奉的宗教扯上了关系。这种情况虽不是太常见，却是预测学界最为危险的倾向，也是最令人感到忧虑的严重问题。回顾中国几千年来预测科学的发展历程，愈是古远愈是原始的预测案例，就愈被认为是“神示”，愈具神秘色彩，迷信成分也愈浓（如商代龟卜）。一种预测手段愈是发展、愈是先进，便必然愈是摆脱神秘色彩、宗教色彩，从迷信走向科学（如从数筮发展到易占，从早期易占到孔子整理周易含蕴的哲学理论，又从周、秦、汉的象数易占发展到宋代邵雍的梅花易数等）。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邵伟华在其理论著作中提出“宇宙是个大信息场”的著名论断，又将“易”与数学二进制、遗传生物学的DNA研究等作了联系比较，终于揭开了几千年漫长岁月里一直罩在周易研究脸上的神秘面纱，使人们恍然大悟：几千年来老祖宗们行之有效的各种预测手段（术数）原来是人类从宇宙大信息场提取信息的工具（硬件和软件）。于是二十世纪末在文明古国中华大

地上兴起的中国文化史上尚无先例的群众性《周易》应用热大潮也因此而向现代科学靠近了一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在预测学刚刚从神秘、迷信和宗教、巫术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向现代科学迈出艰难的第一步的关键性时刻，却出现了前述“依祖制”恢复“施法仪轨”的“复古”、“复旧”倾向（如有个别从事奇门遁甲式占的预测师仍在传授其符籙之术），这岂不等于是在给预测科学重新罩上宗教、迷信、巫术的神秘外衣？岂不是在将预测学迈向现代科学的步伐拉向后转？这种危险的倾向怎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切和注视？

除了上述三个令人忧虑的问题，还有些值得注意的不良风气。如有些预测师急于求成，基本功夫尚未做足，操作技术尚未熟练，便急于成名。这种风气近年来十分普遍，在年青人中尤为常见。其实为求成名而忽略基础理论探讨和基础知识、基本方法之掌握是十分危险的，正如基础不固的高楼，垮起来只是一瞬间的事；不但自己会垮，还会危及左邻右舍。又如有些预测师盲目崇拜古人，生搬硬套过时的旧教条，而不是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剔除糟粕，推陈出新。这类预测师为数确实不少。他们不明白任何一门科学都是要不断破旧立新才有生命力，才能向更高层次发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超越了牛顿的力学理论，而现代多项物理学理论又超越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古代龟卜被易占所取代，而易占又被算命术所超越，算命术今日又面临“综合术数预测法”的挑战。在科学的道路上，后来居上的情况是很正常的，若非后来者推陈出新地研究出超越古人的理论和方法，任何一门科学都会凝滞、萎缩乃至衰亡。所以盲目崇拜古人或固步自封都是不可取的。

面对前述种种令人忧虑不安的现象，笔者认为预测学界从业人士（无论理论工作者还是应用实践者）都有必要较为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预测学的发展历程，对中国预测学理论及实用技术的

发展史作一番回顾，进而反省目前预测学界各种倾向的利害关系，趋利避害，提高素养，促进预测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水平的提高，让中国预测科学在健康的道路上更好地发展。

笔者认为，了解预测学史对预测学界从业人士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中国预测学已有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其间交织着成功与失败、真理与谬误、科学与迷信……许多术数兴盛起来，也有多种术数已在历史的长河中衰亡、消失。人们在预测学发展史中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成功的人物和他们成功预测的案例，也会看到许多失败的人物和案例；人们从中可以吸取古人预测未来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增长见识，在专业工作中可以避免多走弯路。孔夫子说：温故以知新。回顾历史，反思历史，正是知新的好途径。

其二，中国传统的各种预测手段（术数）几乎没有一样不是从“巫术”中产生的，几乎没有一样不是在其诞生的婴幼儿期就被襁褓于荒诞不经的神话中的。但随着人们实践经验不断积累，经历过无数次失败的教训，人们终于从迷信、愚昧、荒谬、虚妄之中醒悟过来，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科学的道理来，使那些实用的技术获得了发展的新空间，甚至能结出震惊世界的丰硕成果（如易占结出的儒家哲学的成果）。因此，认真地回顾和反思各种传统术数的发展史，有助于人们正确判断各种术数的科学“内核”与荒谬“外衣”，从而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提高理论水平和技术水平。只有弄清各种传统术数的发展史，才能正确地批判继承，才不会在倒婴儿洗澡水时连婴儿也倒掉。

其三，科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停滞不前，便可能被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历史所遗弃，甚至从历史中消失。科学创新往往是在继承前人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而完成的，这在科技史上不乏先例。有些古代荒唐的“方术”却孕

育出现代科学的胚胎，例如东方与西方都曾有过荒唐的“炼丹术”、“炼金术”，孕育了现代化学的胚胎。东方与西方古代都有占梦术。在西方，占梦术经近代研究者脱胎换骨的创新，演进成弗洛埃德的心理学新学说；但在中国，占梦术仍停滞在占梦的阶段。中国的预测学，起步比西方早得多，手段（术数）也比西方多，但在二十世纪却显得停滞不前，直至九十年代才出现转机。人们常说：知史方能明道，继往方能开来。这是很有道理的。因此，了解中国预测学的发展历程，有助预测学从业者更好展望预测学的广阔前景，鼓起创新勇气去开拓未来，同时这也是增强预测科学生命力的重要工作环节。

总之，笔者深感了解中国预测学史对预测学从业者和预测科学本身的发展都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概括起来就是：（一）温故知新，增长见识，免走弯路；（二）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批判继承；（三）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永葆青春。而这几点也正是笔者撰著本书的动机所在。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为研究预测学史的指导思想

编撰一本中国预测学史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中国史籍浩如烟海，各类术数书籍不但数量巨大，而且内容极其庞杂，即使只是泛读一过亦非花上十年八年时间不可。各种史籍和术数专著中记载着大量希奇古怪的预测案例，究竟孰真孰假、孰实孰虚，若不用正确的哲学理论为指导去周详地分析，就很容易被书上所记事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因而迷失在荒诞神秘的茫茫书海里而不知所终。

为了不致在史籍和术数专著茂密的丛林中迷失方向，陷入泥